

黄淮海平原中部地区村庄格局演变实证分析

吴文恒^{1,2}, 牛叔文², 郭晓东^{2,3}, 李 钢¹, 陈 辉²

(1. 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西安 710127; 2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兰州 730000;

3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 研究村庄格局演变, 对于制定新时期农村土地利用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一定指导和借鉴意义。以江苏邳州市的吴楼村为典型实例, 采用当面问询式访谈和 GPS 量测的方法分析黄淮海平原中部地区村庄格局的演变。结果表明: 1) 该村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绝对缓慢发展、改革开放前相对缓慢发展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快速扩张、90 年代稳定前进、新世纪逐步衰退的系列演化格局, 并伴随道路和池塘的相应变化。2) 经济原因、社会结构演变、城镇化、村民传统观念变革及不同时期国家政策影响是村庄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 而村内人口数量变化是根本。3) 改革开放以前村庄规模变化较小, 改革开放以来至 90 年代是村庄规模扩大最明显的时期, 2000 年左右村庄内部空弃房屋开始增多。4) 新中国成立后, 人口大量增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核心家庭地位提升以及保护耕地意识淡薄等是村庄规模大面积扩张的主要原因。5) 近期村庄空废房屋大量出现主要缘于城镇化和市场经济影响、户籍管理制度不断放松、种粮比较效益低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等。

关键词: 村庄格局; 规模; 演变; 黄淮海平原中部地区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8)05-1017-10

1 选题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耕地呈持续减少趋势。根据土地详查^[1], 1996 年全国耕地面积为 $1.3003 \times 10^8 \text{ hm}^2$, 到 2003 年耕地面积减少到 $1.2334 \times 10^8 \text{ hm}^2$, 净减 $669 \times 10^4 \text{ hm}^2$, 年均减少 $95.57 \times 10^4 \text{ hm}^2$ 。建设用地增长过快是耕地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扩张规模是扭转耕地减少的重要举措。但事实上, 我国人口增长日渐趋缓, 加速城镇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加快农村人口进城进镇的步伐, 使城镇和工矿建设用地扩张成为必然。

另一方面, 目前农村人口绝对数量减少, 但业已形成的无序利用和粗放管理的村庄规模却没有相应减少, 造成土地闲置。未来城镇化进一步发展, 这一趋势将日益严重。村庄分布零散和规模小, 是难以管理的重要原因。因此, 深入研究村庄发展的历程、趋势及驱动因素, 对于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土地利用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围绕乡村、聚落、村落及农户等问题, 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取得大量富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成果。以乡村或聚落为切入点,

收稿日期: 2007-08-21; 修订日期: 2008-02-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0501007); 西北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吴文恒 (1977-), 男, 江苏邳州人, 博士, 教师。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研究。

E-mail: wuw h04@lzu. cn

Mitchell 等研究了 18 世纪弗吉尼亚聚落系统的演化, 认为其从散布的农耕团体过渡到城镇为单位的聚落体系, 并划分 18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中期开放乡村的邻里体系、4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中期首位型城镇市场体系及 90 年代发达的中心地体系 3 个阶段^[2]; Zhu 探讨了中国乡镇企业所有权及其变化^[3]; Shen 等研究了苏南乡村工业的私有化及乡村城镇化问题^[4]; 范少言等认为, 揭示乡村聚落体系的演变规律是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研究的重点, 并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规模与腹地、等级体系与形态、地点与位置、功能与用地组织、景观类型及区划等方向^[5]; 尹怀庭等对陕西各地传统的农业乡村聚落形成与发展的空间类型、原因作了比较研究, 并总结当时乡村聚落的一些空间演变趋势^[6]; 汤国安等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本技术手段, 探讨陕北榆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与区位特征^[7]; 王鲁民等根据考古及文献资料, 梳理了内聚平等和等级分化的聚落形态及其演进, 指明里坊是在特定的社会进程中由“附城邑寨”衍变而来^[8]。以村落为切入点, 刘沛林等研究了中国古村落景观的空间意象差异^[9]; 陆林等研究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及形成机理^[10]; 卢松等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为例, 研究古村落的旅游环境容量^[11]; 黄怀忠认为人口自然增殖与流动是影响村落生长的主要因素, 融入型人口流动改变了村庄的姓氏结构, 而寄居型人口流动不但在一定时段改变了村庄的姓氏构成, 而且对村落的裂变以及村落数量的增加也有很大影响^[12]。以农户为切入点, Heerink 等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近年中国政策改革对江西省农业生产、投入使用及土壤质量变化的影响, 并提出可持续土地利用的政策建议^[13]; 李小建针对豫西山地丘陵欠发达农区, 研究农户行为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和作用^[14]; 鲁礼新等通过贵州水城县沙坡村 80 家农户的抽样调查分析, 发现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农民适应周围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反应^[15]; 邵景安等利用农访数据, 检查家庭承包制度下农业土地利用的流转规模、流转模式、流转用途等方面内容, 测算样点村现有土地流转状况及其农户解释^[16]。

关于村庄的直接研究, Antrop 研究欧洲的城镇化进程及其景观变化, 指出城镇化对于村庄格局演变有着重要影响作用, 并区分了大城市附近村庄、都市型村庄和偏远村庄的格局变化^[17]; Madubansi 等研究了实施电气化计划后南非 5 个村庄用能状况和消费方式的变化^[18]; Lepp 调查乌干达 Bigodi 村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 结果显示居民对旅游业一直持积极态度, 这种态度促进了社区发展、改善了农业市场并增加了居民收入^[19]; 折晓叶研究中国东部和南部的超级村庄个案, 认为这类村庄是在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同时并存的冲突与共生中发展的^[20]; 赵哲远等考察浙江省部分县市的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现状, 指出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宅基地管理粗放等问题是造成耕地减少的重要因素^[21]; 刘韶军以河南省为例, 分析欠发达地区城市边缘区村庄发展特征^[22]; 李培林^[23]、蓝宇蕴^[24]以广州城中村为例, 研究村庄城市化的系列问题; 王跃生立足冀南地区, 研究 20 世纪 30~ 90 年代不同时期华北农村复合家庭与核心家庭的主导地位^[25]; 张正河研究了新疆和甘肃牧区村庄的决策权问题^[26]; 宋婧等以苏南某村为案例, 研究经济转型对村庄公共权威蜕变的深刻影响^[27]; 王跃等利用遥感和 GIS 技术, 从面上探讨苏州城郊 390 个村镇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基本表现规律, 进而提出村镇布局调整的决策方法^[28]; 田光进等^[29]、龙花楼等^[30]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角度分别研究近 10 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与长江沿线样带农村宅基地转型问题; 程连生等^[31]、薛力^[32]、王成新等^[33]分别以太原盆地东南部、江苏省及北公村为例, 主要探讨农户向原聚落四周拓展致使聚落或村庄空心化的问题, 但弱化了人口向城镇转移对村庄空心化的影响作用。事实上城镇化正

在或逐渐成为村庄空心化的重要驱动力^①。以上有关格局演变的研究大多从中、宏观层面入手, 微观上分析不足; 有关村庄的研究亦多从社会问题或历史问题的角度切入, 较少谈及村庄的空间发展问题。因此, 村庄内部的形态演变研究有待深入。

2 吴楼村的个案分析

黄淮海平原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是重要的农耕区和商品粮基地, 人口稠密, 村庄密布。其市场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 村庄内部发展问题突出, 探索研究的典范性较强。受区域大环境影响, 同一地区的诸多村庄在发展历程、形态演变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只是时间上提前或者滞后。因此, 典型村庄的个案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区域内村庄的某些共性特征。作者选择黄淮海平原中部地区的吴楼村作为剖析对象, 并于2006年2月和10月对其进行了详细调查(访谈、家谱)和基于GPS的数据量测。采用当面询问式访谈了17人, 其中年龄最大87岁(私塾2年)、最小33岁(初中学历); 60岁以上9人(私塾3人、小学3人、文盲3人), 60岁以下8人(小学6人、初中2人)。

2.1 典型性分析

吴楼村位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苏北平原地区, 行政隶属江苏邳州市(县级市, 归徐州市管辖)碾庄镇, 西距徐州市51.67 km, 东距邳州市19.20 km; 距离最近的两个镇(东北向的碾庄镇和西向的八义集镇)分别为4.51 km和6.34 km(图1)。乡村公路是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 交通较为闭塞^②。

村庄东西长320 m、南北宽210 m, 总占地约7.5 hm²。目前, 在住73户, 计238人。其中, 3户姓柳, 其余姓吴, 为典型单一宗族型村庄^[12], 人口自然增殖是其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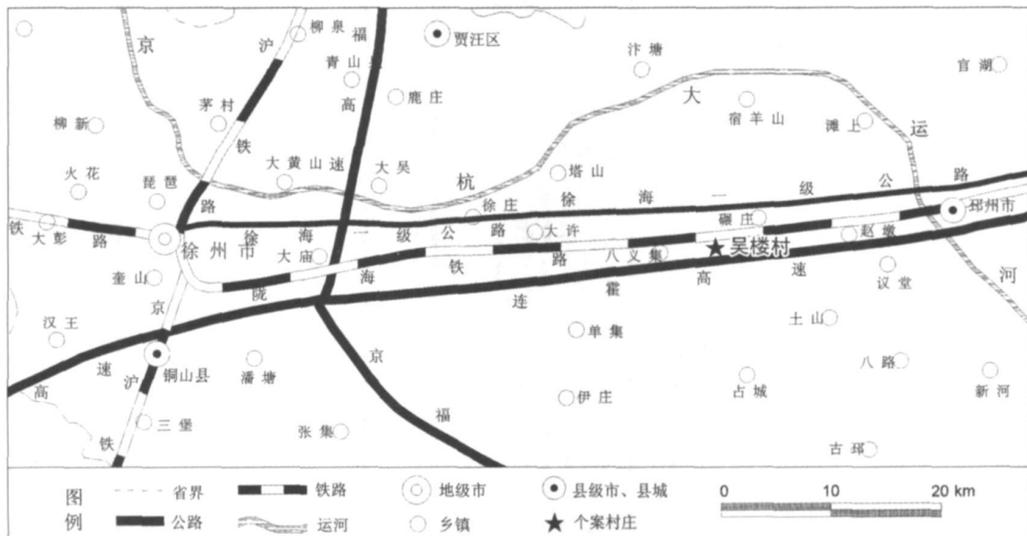


图1 吴楼村交通区位图

Fig. 1 Location and traffic of the Wulou village

①本文把村庄作为整体探讨其空心化问题, 外延了“中心废弃、外围拓展”的村庄空心化概念。

②这里主要从村庄自身微观的角度考虑, 从整体的中宏观角度考虑该地区的交通条件仍相对较好。

其典型特征包括: (1) 该村既不临市也不靠镇, 避免了因靠近市镇村民就近务工的“离土不离乡”发展模式; (2) 村内既无乡镇企业也无私人工厂, 从而避免了大量村民在村内发展而影响村庄格局演变的形态和进程; (3) 每年的6月夏收和10月秋收是村民的农忙季节, 其他时间则较为清闲, 从而兼营式发展成为可能, 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 (4) 村庄出现后, 经历了缓慢发展、快速扩张、稳定前进、逐步衰退等变化阶段。

2.2 村庄格局变化

根据访谈调查与实地面积量测, 得到吴楼村不同典型时期有人居住的宅基地面积变化曲线^① (图2), 并据此将其格局演变划分为如下阶段。

道光二十五年 (1845), 一吴姓人家从西南10余公里处的石桥村迁居至此, 吴楼村开始出现。其规模仅限于现今格局的一隅 (图3a), 面积约0.2 hm²。新中国成立前 (1949), 村庄经历了绝对缓慢发展阶段 (图3b), 向外扩展速度和幅度不大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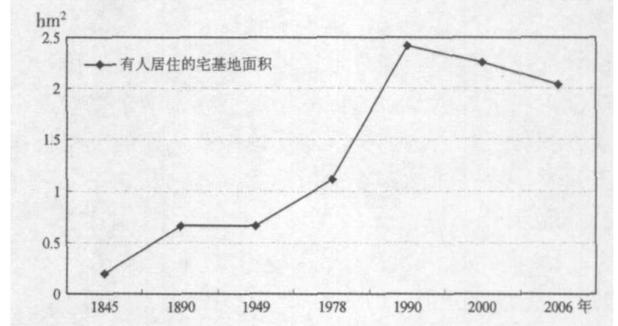


图2 不同时期有人居住的宅基地面积变化 (1845~2006)

Fig. 2 Location and traffic of the Wulou village

年扩大0.46 hm²), 基本维持在光绪十六年 (1890) 分家后兄弟四人各据一方的态势^②。改革开放 (1978) 前, 村庄经历了相对缓慢发展阶段 (图3c), 在原规模基础上向前后仅有少数人家零星、分散出 (29年扩大0.45 hm²), 且宅院规模较小, 反映这一时期核心家庭得到发展, 复合家庭成分开始下降^[25]。改革开放 (1978) 以来, 村庄格局变化最为剧烈 (图3d), 大量耕地被蚕食为村庄建设用地, 可细分为20世纪80年代快速膨胀扩张 (12年扩大1.3 hm²)、90年代内部填充兼内部闲置的稳定前进以及新世纪空废房屋大量出现的逐步衰退三个阶段。这一时期核心家庭已稳定占据主导地位, 并且家庭居住面积也扩大了许多, 由前一时期一户大多两间房屋扩展为至少三间。目前, 当地规定宅基地标准为12 m×18 m, 但每户实际使用面积均大于此。

村庄人口增多和规模扩大也带来内部道路结构和池塘格局的变化。图3a时期, 村内人口少, 村庄规模小, 仅有房屋前^③一条横向道路和两条纵向道路, 且主要为田间小道。由于垫高宅基以及修建房屋等原因, 人工开挖的面积较小池塘呈半包围状分布于房屋的东侧和后侧。图3b时期, 随着人口增多和对外联系加强, 已有的两条纵向小道日益成为村内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 同时新增了两条联系东西方向住户的横向道路。原有池塘面积逐渐增大, 并在南北向道路西侧开挖了一处新池塘。图3c时期, 村庄内部的道路骨架已初具规模, 即形成了三条纵向道路和一条内部横向道路 (前两排房屋与后三排房屋之间) 为主的结构, 而其他道路仍是农户出行的便道。此时, 两个池塘在原有基础上都被扩大了许

^①本文农村宅基地指广义的农村居民居住和生活所使用的土地, 即农村村民所建住房以及与居住生活有关的建筑物和设施用地, 也就是住房用地及其必要的附属设施用地。

^②该吴姓人家共有五子, 长子到别处建房, 其余四兄弟在父亲去世后各分得部分房屋: 小儿子得后排老宅基地的房子; 四子得中间部分东侧的双排房屋; 三子没有儿子, 得中间部分西侧的单排房屋, 后被返回村庄的长子后人继承; 次子得西侧的整个地块。之后, 各分支的后人主要围绕祖先遗留下的根基向外拓展。时至今日, 当初分家的格局依然非常明显。

^③图中示意的房屋均指南背北而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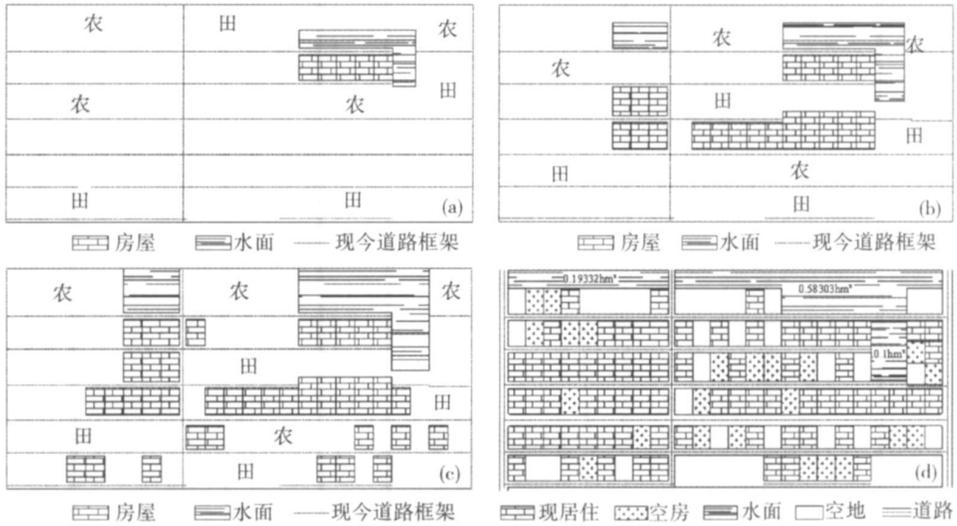


Fig 3 Sketch map of the pattern evolution in Wulou village

多。图 3d 时期, 村庄道路结构日益完善。被农田、林地、池塘等隔断的数条东西向道路先后被打通; 大部分道路被拓宽; 两条纵向道路(村庄两侧)和一条横向道路(前两排房屋与后四排房屋之间)被多次重点修整并确定为主干路; 新修了一条道路(最后一排房屋前)。前一时期的两个池塘面积变动不大, 并一直保持原来的格局延续到 2004 年^①。为连通村内与村外的众池塘并疏浚河道, 打通东西向不连通道路并新增部分宅基地^②, 2004 年底将原有的两个池塘被分割为彼此连通的三块。

2.3 成因剖析

2.3.1 改革开放前

鸦片战争(1840)后, 石桥周围匪盗遍地, 民不聊生^③。为看护自己土地, 石桥吴氏大户人家派一子到现今村庄位置经营、看管农田。他挖塘筑高地, 修建房屋, 设置炮楼, 自此吴楼村初具形态。至新中国成立前, 受战乱、饥荒等影响, 村内人口自然增殖缓慢, 且除一柳姓长工和诸多短工外, 鲜有人口流入, 加之以数代同堂或兄弟婚后不分家的复合型家庭占绝对比例, 因而村庄规模增幅较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集体经济前期(20世纪50年代), 躲避战乱的村民陆续回村, 并在土地改革(1950)后拥有一定土地经营, 人们生活逐步有所保障, 但生活空间需求小, 并且建房的经济能力弱, 大多在各家老房子居住, 村庄格局基本未变化。在影响人口增殖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后的集体经济中期(20世纪60年代), 随着农业政策曾

^①村内池塘面积变动不大, 不等于村民不新建房。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村民就已在村内与村郊区同时开挖池塘以垫高宅基地和修建房屋; 80 年代村内池塘以深挖为主, 扩展不大; 90 年代基本稳定。

^②这种做法后来被认为是劳民伤财的一件事情, 花了大量钱财却不见任何效果, 并且村内已有较多空废房屋, 而又要开辟新宅基地以解决部分村民的居住问题。事实上, 该村属于精英式管理。在一次与房主交谈中, 他谈起, 2004 年的修浚河道和完善道路主要是因为算命先生给他占了一卦, 认为在两家紧邻的他四哥和已故五哥房屋后挖开一条大道并且在房屋后面堆起高高的土堆有利于破除他们大家庭的晦气, 所以才促成了村庄道路和河塘格局的进一步变化。

^③引自《吴氏宗谱》石桥支谱, 1993 年编。

经一度变得宽松, 村内出现包产到户的做法, 人们生活又有了一定转机。在征得村集体同意后, 仅有 2 户人家从原宅基地分离出去, 村庄扩张速度依然较慢。当然, 当时以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 所以把集体土地用作自己私人建房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另一方面, 生活困难和“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迫使小部分成分不好的人口远走他乡, 也给村庄规模扩张带来少许影响。集体经济后期(20世纪70年代), 原来空间已远不能容纳逐渐释放出来的人口, 因而村庄扩张相对较大。但由于经济发展条件限制, 这一时期新建的房屋仍以土木结构为主^①。总体看, 人民内部矛盾和问题远小于战乱带来的困难, 加之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 因此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数量相对庞大, 直接造成后期村庄规模大幅度扩张。

2.3.2 改革开放以来 20世纪8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蓄积起来的大量人口, 加之少部分外流人员返乡, 居住空间严重不足, 致使这一时期大量自留地和良田直接或间接转换为宅基地。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户经济状况好转, 以及农户宅基地审批趋于宽松, 使这一时期房屋大量建设成为可能并以砖木结构为主。另一方面, 该时期实行的排房规划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庄无序蔓延的状况, 出现相对整齐的居住房屋, 但村民受教育程度低^②, 保护耕地意识淡薄, 尤其年龄较长者“多一处宅基多一份家业”的传统小农思想强烈, 也直接造成部分村民一户多宅和低洼地无人要的现象, 村内出现大量空地的同时也间接致使村庄规模外扩。这一阶段村庄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现今格局已具雏形。80年代后期, 由于农转非(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接替工作等原因, 少许人口陆续迁出村庄进入城镇(表1), 但村内基本没有空弃房屋。

表 1 不同时期迁出家庭及去向(1980~2006)

Tab 1 Immigrating places and emigrating households from the 1980s to the year 2006

时期	迁出去向(户)	总计(户)
20世纪80年代	邳州市(1)、碾庄镇(2)、海口(1)	4
20世纪90年代	邳州市(5)、碾庄镇(6)、八义集镇(1)、官湖镇(1)、佳木斯(3)、鸡西(1)、灯塔(2)、黑龙江(1)	20
2000~2006年	邳州市(4)、碾庄镇(1)、郑州(1)、温州(1)、鸡西(2)	9

90年代,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村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改善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成为村民的首要任务, 而核心家庭的大量增加仍是村庄规模扩大的直接推动力^③。这一时期房屋建设多在村庄边缘、内部填空找补或旧房翻新, 并以砖瓦房或楼房为主, 向外扩张速度趋于缓和, “建房热”慢慢消退, 村庄进入成熟发展时期。由于一户多宅或空闲自留地不能及时回收, 故村内仍有一定闲置地, 并延续到今天。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农村的影响深远而巨大, 并促生了村民传统观念的变革^[34]。农业

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拥有了自由使用和支配土地的空间。在不能四处乱占土地等政策前提下, 农户一方面申请村内空闲土地建房, 另一方面也利用村庄边缘自家耕地、村民互换土地(远处耕地-村边耕地、远处耕地-村边或村内自留地等)或出资找补土地等方式建房, 促成村内及村庄边缘部分土地转为宅基地。这一时期村庄规模的扩张比改革开放前相对容易许多。

②调查显示, 村民普遍是小学文化乃至文盲, 极少部分是年龄较大的私塾教育和年龄稍轻的初中教育。

③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大量男孩, 大多在80~90年代陆续进入结婚年龄, 在80~90年代经济水平逐渐好转和当地大众攀比风气的影响下, 无论经济水平稍高或者稍低的家庭, 给新婚儿子另建或被(女方)要求另建一处新房基本是一道必须的程序, 往往也被父母视为一件大事。当然, 也有部分结婚较早(70~80年代)并依靠自己的努力在80~90年代另建新房以改善居住条件的家庭。

收入已远不能满足其经济需求,人们在改善家庭住房空间的同时,多渠道寻找经济发展空间和更好的生存空间的意识也与日俱增^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不断变化,村内农闲外出打工、搞私人运输、进城进镇经商或工作的人口不断增多。其中一些在打拼下一定基础且经济收入达到相当程度后最终脱离村庄,进入城市或城镇发展,而其村内的房屋却依然保留,从而带来村内建房与弃房相伴而行的格局。90年代村内先后迁出20户人家,以其所隶属的邳州市与碾庄镇为主。

2000年以来,得益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每个家庭至多只有一个男孩的比例达90%以上^②。这样,村里的家庭在不向外迁移的情况下,村庄将基本保持等比规模向前发展较长时间。但事实上,不断外移的人口已使村庄提前进入衰退阶段,空废房屋大量出现,只是幅度小于20世纪90年代。

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户籍管理制度的不断变化,正在逐步成为靠近沿海发达地区的黄淮海平原中部地区村庄空心化的直接吸引力,而种粮比较效益低下则成为村庄空心化的重要推动力。

3 结论和启示

3.1 结论

吴楼村是典型的单一宗族型村庄,人口自然增殖以及经济发展是其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因。村庄历史仅有160余载,但在区域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下,其格局演变经历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出现、新中国成立(1949)前绝对缓慢发展阶段、改革开放(1978)前相对缓慢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迅速扩张时期、90年代稳定前进时期以及2000年以来衰退发展时期等过程。村庄格局的演变,主要应归因于经济原因、社会结构演变、城镇化、村民传统观念变革及不同时期国家政策的影响,而村内人口数量变化是其演变的根本。

通过典型村庄发展的个案分析可以发现,黄淮海平原中部地区村庄格局演变有着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改革开放以前村庄规模变化较小;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是村庄规模扩大的最明显期;2000年左右村庄内部空弃房屋开始增多,伴以空余宅基地(或自留地),造成较大面积的土地闲置。其村庄规模的大面积扩张主要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生活基本稳定,加之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大量增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促使人们有能力改善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核心家庭地位的提升以及保护耕地意识淡薄等方面。近期村庄空废房屋大量出现或空心化主要缘于:城镇化和市场经济直接拉动人口脱离村庄进入城镇发展;户籍管理制度不断放松使人们活动更为自由;种粮效益低下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对人口尤其男性自然增殖的控制作用。目前看,在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大环境下,未来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和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放开,村庄人口规模不断减少并逐步趋于新的稳定将是普遍趋势。然而,村庄建设用地并不会自然地减少,仍需由政府引导下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序退让为耕地、园地等。

^①调查中,村民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是,在家务农(主要指单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户,不包括大面积种植蔬菜、瓜果、棉花等经济作物和家庭养殖的农户)两个季节忙(6月夏收和10月秋收),其他时间比较清闲,而且在粮价相对不高的情况下,除掉种子、化肥、农药、耕种、收割等成本费用外,收入所剩无几。然而,出外打工、经商等基本上天天可以有或多或少的收入,节省了家庭口粮,也增加了收入。

^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尤其20世纪90年代后,第一胎为男孩的村民基本不再要孩子;若第一胎为女孩,一般会偷生到有男孩为止;也有部分人家仅有女儿。女儿外嫁到男方是村内的一般习俗,从这个意义上说,村内男孩的多寡是决定村庄规模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

村庄类型多种多样,尤其人口密集、村庄密布地区。本文个案仅仅代表了区域村庄的一种类型,仍需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区域内其他类型村庄格局的演变,以便提炼出更有实际意义、代表意义和综合意义的区域村庄格局演变特征。

3.2 启示

特定环境条件下,村庄格局的演变有其特定的历史轨迹。人口既是其演变的驱动者,也是控制者。在耕地和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镇化快速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应当根据时代发展的趋势和需要,有目的、有方向地引导村庄建设合理、有序进行。

加强宣传工作,增强耕地保护意识。目前,该地区乃至全国的外延式村庄发展仍占一定比例,但未来势必也将步入规模稳定、内部房屋空废的发展阶段,因此当前尤其应加强对这一类村庄的管制。同时,应注重源头的宣传教育工作,让村民切实认识到保护耕地的重要性 and 紧迫性以及乱建、滥建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走内部充实提高的村庄用地发展政策,从而达到逐步稳定村庄规模并循序退让宅基地为耕地的目的。

加强村庄宅基地管理,节约土地资源。科学预测村庄未来人口规模,划定农村居民点建设范围区,引导村民在规定范围内有序建房。切实履行国家规定的农村居民每户只能有一处不超过标准的宅基地,超过标准的依法收归集体所有^[33]。对一户多宅、空弃房屋、超占宅基地行为实行有偿使用或出让制度,努力扭转村庄内部“有的住不完,有的没地住”的恶性局面,盘活土地,集约使用,提高利用率;对于空废连片的宅基地、自留地,应逐步整理为耕地或其他用地。

因地制宜,合理有序进行村庄规划。城镇化导致的村庄规模衰落或空心化正在或逐步成为其发展的主导方向。合并村庄^[30]、迁村并点^[35]等方式固然是解决村庄土地资源浪费的一种办法,并已在黄淮海平原部分地区试点实施,但从我国目前的财力、物力看,尚不足以大面积解决村庄迁并工作,成本巨大。另一方面,村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的淀积中而出现的,形成了比较适合和稳固的村民农耕半径和料理空间,在现阶段尚不能锐减农村人口并实现大面积机械化耕作的情况下,陡然加大部分人口的农耕半径和管理成本,可行性不大。应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分类分地区进行村庄规划,充分尊重村庄发展的自然演变规律,宜并则并,宜缩则缩,尽量在原址进行村庄规划。

参考文献:

- [1] 陈百明,周小萍. 中国近期耕地资源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变化态势. 资源科学, 2004, 26(5): 38~ 45
- [2] Mitchell R D, Hofstra W R. How do settlement systems evolve? The Virginia backcountr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995, 21(2): 123~ 147
- [3] Zhu T. A theory of contract and ownership choice in public enterprises under reformed socialism: The case of China's TV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1): 59~ 71
- [4] Shen X, Ma L J C. Privat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and de facto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in southern Jiangsu, China. *Geoforum*, 2005, 36(6): 761~ 777
- [5] 范少言,陈宗兴. 试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研究内容. *经济地理*, 1995, 15(2): 44~ 47
- [6] 尹怀庭,陈宗兴. 陕西乡村聚落分布特征及其演变. *人文地理*, 1995, 10(4): 17~ 24
- [7] 汤国安,赵牡丹. 基于GIS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研究——以陕北榆林地区为例. *经济地理*, 2000, 20(5): 1~ 4
- [8] 王鲁民,韦峰. 从中国的聚落形态演进看里坊的产生. *城市规划汇刊*, 2002, (2): 51~ 54
- [9] 刘沛林,董双双. 中国古村落景观的空间意象研究. *地理研究*, 1998, 17(1): 31~ 38
- [10] 陆林,凌善金,焦华富,等. 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及其机理. *地理研究*, 2004, 23(5): 686~ 694

- [11] 卢松, 陆林, 徐茗, 等. 古村落旅游地旅游环境容量初探——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为例. 地理研究, 2005, 24(4): 581~ 590
- [12] 黄怀忠. 人口的增殖流动与明清华北平原的村落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丛论, 2005, 20(2): 67~ 73
- [13] Heerink N, Qu F, Kuiper M, *et al.* Policy reforms, rice production and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China: A macro-micro analysis. *Agricultural Systems*, 2007, 94(3): 784~ 800
- [14] 李小建. 欠发达农区经济发展中的农户行为——以豫西山地丘陵区为例. 地理学报, 2002, 57(4): 459~ 468
- [15] 鲁礼新, 马昌河, 鲁奇. 水城县沙坡村农户经济行为调查研究. 地理研究, 2004, 23(2): 218~ 226
- [16] 邵景安, 魏朝富, 谢德体. 家庭承包制下土地流转的农户解释: 对重庆不同经济类型区七个村的调查分析. 地理研究, 2007, 26(2): 275~ 286
- [17] Antrop M. Landscape change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Europ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7(1-4): 9~ 26
- [18] Madubansi M, Shackleton C M. Changing energy profiles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following electrification in five rural villages, South Africa. *Energy Policy*, 2006, 34(18): 4081~ 4092
- [19] Lepp A.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in Bigodi village, Uganda.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3): 876~ 885
- [20] 折晓叶. 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 中国社会科学, 1996, (3): 66~ 78
- [21] 赵哲远, 戴朝卓, 沈志勤, 等. 农村居民点土地合理利用初步研究——以浙江省部分县市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 1998, (5): 68~ 73
- [22] 刘韶军. 欠发达地区城市边缘区村庄发展特征及规划布局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城市规划汇刊, 2000, (3): 64~ 67.
- [23] 李培林. 巨变: 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1): 168~ 179
- [24] 蓝宇蕴. 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2): 144~ 154
- [25] 王跃生. 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4): 93~ 108
- [26] 张正河. 中国牧区村庄决策权研究——以新疆和甘肃为例. 管理世界, 2004, (1): 71~ 81
- [27] 宋婧, 杨善华. 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6): 129~ 142
- [28] 王跃, 陈亚莉. 苏州城郊村镇分布特征. 地理学报, 2005, 60(2): 229~ 236
- [29] 田光进, 刘纪远, 庄大方. 近10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 地理学报, 2003, 58(5): 651~ 658
- [30] 龙花楼, 李秀彬. 长江沿线样带农村宅基地转型. 地理学报, 2005, 60(2): 179~ 188
- [31] 程连生, 冯文勇, 蒋立宏. 太原盆地东南部农村聚落空心化机理分析. 地理学报, 2001, 56(4): 437~ 446
- [32] 薛力. 城市化背景下的“空心村”现象及其对策探讨——以江苏省为例. 城市规划, 2001, 25(6): 8~ 13
- [33] 王成新, 姚士谋, 陈彩虹. 中国农村聚落空心化问题实证研究. 地理科学, 2005, 25(3): 257~ 262
- [34] 龙花楼. 中国农村宅基地转型的理论及证实. 地理学报, 2006, 61(10): 1093~ 1100
- [35] 张军民. “迁村并点”的调查与分析——以山东省充州市新集镇寨子片区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 2003, (8): 57~ 62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village pattern 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part of Huang-Huai-Hai Plain

WU Wen-heng^{1,2}, NIU Shu-wen², GUO Xiao-dong^{2,3}, LI Gang¹, CHEN Hui²

(1. Department of City and Resource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village pattern evolution is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to consti-

tute the policy of land utilization in the new period and to build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The Huang-Huai-Hai Plain,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East China, is the important farm belt, and consists of multitudinous villages with a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is region, the marketization level and urbanization level are high because of close to the coastal developed areas, and the interior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the villages are prominent such as a mass of farmlands being occupied, and too many houses being abandoned. So it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regions to research problems of village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the study related with countrysides, settlements, farmers, and villages have been reviewed. Studies of the village pattern evolution on macroscopic scale were much more than those on microscopic scale, so microscopic stud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better understand village development. The Wulou village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Huang-Huai-Hai Plain was chosen as a typical case. The face-to-face interview and the 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 measurement method were used in the study.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Wulou village went through a series of evolution pattern including the absolute tardiness development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relative tardiness development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the fast expansion in the 1980s, the steady scale in the 1990s and the recessionary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In the meantime, the roads and ponds in the village have also been changed correspondingly. Secondly,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village pattern evolution included economic improvement,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urbanization and the effect of national policy. However, population variation was still the decisive factor. Thirdly, the change of village scale was not obvious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the expansion of village scale was prominent from the 1978 economic reform to the 1990s, and the empty and abandoned houses have increased largely since about 2000. Fourthly, the previous village expansion attributed to four aspects as follows: No family planning after 1949 resulted in population increasing enormousl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enabled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habitations; the status of nuclear families (namely a family consists of few people which only include husband, wife and their children in general) was enhanced step by step; and farmers were not conscious of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plantations. Finally, the causes leading to abandoned houses lately are that the urbanization and market economy are becoming or will become the direct drive of the village hollowing at present; the profit of planting grains is so low that it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impetus of the village hollowing; and the fast increase of population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by the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since the 1980s.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quo of the village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area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demand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brought forward.

Key words: village pattern; scale; evolution; the central part of Huang-Huai-Hai plain